

王复兴 主编

省志编纂学

齐鲁书社



省志编纂学

王复兴 主编

齐 鲁 书 社

K290
Z

鲁新登字07号

省志编纂学

王复兴 主编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 2插页 343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7—5333—0256—7

K·42 定价: 7.00 元

124583

序

行省之有志乘，始于元代。如大德《云南志略》、至元《齐乘》皆是，元统《越南志略》亦此类。明志存十六种，或称总志，或称通志。清康熙十一年，准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之请，诏令各省纂修通志。清志有六十四种。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令各省、市、县修志，民国通志凡五十七种。嘉庆《广西通志》载承详明，体例雅饬，见称于阮元，所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即取为法，梁启超誉为省志的楷模。民国廿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南、湖北、山东、畿辅、浙江、广东六种通志，都是体例完善、史事详备、通志之佼佼者，可供今天批判继承之用。

“志属史体”，故撰史修志其义一揆。刘知几论史有才、学、识三长之说，并伸“尤须好事正直、善恶必书”史德之义。章学诚论史，演其遗绪，以义、事、文三要与史德并称史家四要。义谓义理，即史识，指体例史法、抉择去取与史德；事谓学，指史材所资与考据；文谓才，指词章。综三长、三要、四要言之，即是今天所谓编纂之学。这些传统的史志理论，又是可供今天批判继承的一个内容。

王复兴同志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十年后回考了母校历史学硕士学位，而后又从事方志编纂和研究十年。既

有史志理论结实的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了提供编写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参考，1987年出版了《方志学基础》，今又主编了《省志编纂学》。复兴同志服膺章学诚之学，本“统部自有统部志例，非但集诸府州志可称通志”之义，以为省志的编写与一般志乘不同，遂邀集各省方志编纂委员会同仁与方志专家撰成此书。既批判继承了我国方志的传统，复出新意，为书八章，首论省志总体与各分志的共性问题，如指导思想、总体设计、资料工作、以事系人、详略、纵写、总纂等等，次及各分志的编纂法，计三十余万言。言简意赅，便于披诵。专论省志编纂者，尚属少见。这部津梁之书，必将为推动省志的编写和提高省志的质量，起到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九八六年，董一博先生序《方志学基础》中有云：“作者正在把改革作为主旋律对方志理论及其方法作新的探讨，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大的贡献，吾人将拭目以待。”果然，不到五年，即实现了这一预言。何其速耶！希望三五年后，王复兴同志在方志界能育出更大的新硕果！

一九九一年岁次辛未长至前三日

傅振伦书于北京

前 言

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资料性著述。我国的方志源远流长，数量极多，仅保存到现在的就有八千二百多种，约十二万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随着编修方志实践的发展，人们自然要对方志的性质、体例、编纂方法等进行探讨，这便出现了方志理论研究。清代以前，有关论述散见于志书的序、跋和凡例中，很不系统。到了清代，章学诚等著名学者参与方志编纂，并对方志理论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出现了专门论著，使方志理论系统化，于是形成了方志学。民国时期，由于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参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都有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旧方志的研究、利用和新方志的编修。全国成立了地方志小组，许多省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并开展了工作。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使这项工作停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新方志的编修又提上日程。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成立了地方志指导小组，各省、地、市、县几乎都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编写机构，一个前所未有的修志热潮在全国兴起，充分显示了“盛世修志”的局面。编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县情、市情、省情、国情调查，既有利于当代，又惠及后世，意义是很重大的。

本届修志一开始，广大修志者就明确提出，既要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又要勇于创新，使我们编修的志书明显区别于旧志，而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现在看来，创新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指导思想上，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组织上，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部门承编；体例上，增设述体和许多新门类；内容上，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突出人民群众的活动；编写方式上，专业工作者、本部门本行业人员、专家学者、领导人相结合，众手成志，特别是各级领导积极支持、领导修志工作，并参与审稿把关，对保证志书质量有重要作用。

从全国来说，本届修志已历十年。起步早、进展快的志书已开始出版。同时，各地方志刊物发表了大量探讨新方志的性质、功用、体例、内容、编写方法以及如何继承创新的文章。现在是到了对编志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时候了。而且，大量的志书还在编写中，亟需方志理论指导，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方志编纂法的书不多，特别是系统地论述省志编纂法的书尚属空白。我在全国的几次研究班讲课时，许多同志都反映：要提高志书质量，必须学习方志理论；希望能读到有针对性的实用的方志理论著作。适应形势的需要，我打算编写一本关于省级志书的编纂学。但受学力和精力限制，一个人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任务是很困难的。我想到了组织有志者共同编写的方法。我的想法得到了各省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大家通力合作，历经两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省志编纂学》。

本书各章按论述的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论，分节论述省志总体和各分志的共性问题；另一类是分论，分节论述各分志的编纂法。本书是专论省级志书（包括省、市、自治区志编纂法的，但由于各类志书具有共性，因此也可供编写县志、市志、地区志及他类志书参考。

本书各章节由在这方面有较深研究的同志撰写，具体分工如下：丁喜元第五章第十二节，马扬第五章第十节，马素琰第二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节，马雷第四章第五节，王中明第三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五节，王享治第三章第三节，王宗洲、陈明乾第四章第八节，王复兴第一章第二节，王景玉第二章第五节，邓谷君第五章第四节，左新梅第一章第十节，安林第六章第十四节，刘卫平第四章第四节，刘柏修第四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关克辛第七章第十节，江书中第四章第三节，孙元成第六章第二节，乔大钧第七章第九节，沙永良第五章第十四节，严寒第一章第五节和第八节，张大廷第五章第八节，张兴文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张秀梅第三章第四节，张鸿魁第八章第四节，张桂江第五章第十六节、第六章第八节和第十二节、第八章第二节，张曙东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李卫东第六章第十三节，李芝发第五章第一节，李宝田第三章第一节，李学忠第二章第二节、第七章第八节，李景煜第一章第六节，谷清泉第五章第十一节，何明栋第八章第五节，余树声第一章第一节，苑广才、孙宝君第一章第七节，欧永山第五章第十三节，武连环第四章第七节，洪期钧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第一节，娄福恩第四章第二节，赵文山第六章第三节，胡昭镒第七章第六节，袁仲翔第三章第五节，夏一鸣第六章第五节，陶学宪第六章第十节、第七章第四节和第七

节，钱金喜第七章第三节和第五节，徐宝林第五章第九节，徐杰第六章第十五节，徐家麟第六章第九节，梁勇第四章第九节，黄锦库第七章第二节，盛树森第一章第九节，崔岗峰第六章第十六节，渠志杰第四章第十节，温洪镭第六章第七节，谢光华第六章第四节，蒋子云第五章第十五节，雷文第二章第六节，葛洪模第七章第十一节，傅德宝、倪玲第六章第六节，杨永富第五章第七节，谭冬初第五章第二节，熊宗仁第七章第一节，颜小忠第三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十一节。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各省的编志经验和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并得到老一辈方志学家、有关领导和许多方志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齐鲁书社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为本书出版提供了条件，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志界专家、各地方志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王 复 兴

1991年2月16日

撰 著 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喜元	马 扬	马素璉	马 雷	王中明
王享治	王宗洲	王复兴	王景玉	邓谷君
左新梅	安 林	刘卫平	刘柏修	关克辛
江书中	孙元成	孙宝君	乔大钧	沙永良
严 寒	张大廷	张兴文	张秀梅	张鸿魁
张桂江	张曙东	李卫东	李芝发	李宝田
李学忠	李景煜	谷清泉	何明栋	余树声
苑广才	欧永山	武连环	陈明乾	洪期钧
娄福恩	赵文山	胡昭镒	袁仲翔	夏一鸣
陶学宪	钱金喜	倪 玲	徐宝林	徐 杰
徐家麟	梁 勇	黄锦库	盛树森	崔岗峰
渠志杰	温洪镭	谢光华	蒋子云	雷 文
葛洪模	傅德宝	杨永富	谭冬初	熊宗仁
颜小忠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编写省志的指导思想	1
第二节 省志的总体设计	11
第三节 省志资料工作	30
第四节 省志的详略	36
第五节 省志的竖写	45
第六节 省志的总纂	51
第七节 方志的文体	56
第八节 交叉内容的处理	66
第九节 因事系人写法	71
第十节 坚持省志质量的高标准	78
第二章 综合部类编纂法	83
第一节 序言和凡例	83
第二节 总述	90
第三节 概述	93
第四节 大事记	99
第五节 人物志	102
第六节 图表	108
第三章 自然部类编纂法	113

第一节 地理志	113
第二节 建置志	123
第三节 地质矿产志	127
第四节 地震志	132
第五节 江河志	137
第六节 湖泊志	142
第四章 政治部类编纂法	147
第一节 党派志	147
第二节 政权志	153
第三节 民政志	157
第四节 司法志	165
第五节 外事志	172
第六节 侨务志	176
第七节 群众团体志	180
第八节 劳动志	184
第九节 政治运动	191
第十节 军事志	195
第五章 经济部类编纂法（上）	203
第一节 农业志	203
第二节 农业机械志	210
第三节 林业志	216
第四节 水利志	220
第五节 畜牧志	224
第六节 水产志	230
第七节 煤炭工业志	236
第八节 电力工业志	243
第九节 冶金工业志	248
第十节 化学工业志	253
第十一节 建材工业志	258

第十二节 机械工业志	262
第十三节 电子工业志	266
第十四节 轻工业志	272
第十五节 纺织工业志	277
第十六节 交通志	283
第六章 经济部类编纂法 (下)	293
第一节 铁路志	293
第二节 邮电志	298
第三节 城乡建设志	304
第四节 建筑志	309
第五节 商业志	314
第六节 供销合作社志	321
第七节 粮食志	326
第八节 物资志	333
第九节 财政志	340
第十节 金融志	345
第十一节 旅游志	353
第十二节 国民经济计划志	357
第十三节 工商行政管理志	365
第十四节 物价志	369
第十五节 统计志	374
第十六节 标准计量志	378
第七章 文化部类编纂法	385
第一节 社会科学志	385
第二节 科学技术志	391
第三节 教育志	397
第四节 文化志	401
第五节 文物志	405

第 六 节 出版志	409
第 七 节 广播电视志	416
第 八 节 档案志	420
第 九 节 体育志	425
第 十 节 卫生志	430
第十一节 医药志	436
第八章 社会部类编纂法	441
第 一 节 人口志	441
第 二 节 民族志	446
第 三 节 风俗志	450
第 四 节 方言志	457
第 五 节 宗教志	464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编写省志的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编写的指导思想，这是使省志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历史价值的根本保证。这里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从本质意义上说，便是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编纂省志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具体地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定，为新省志编纂学确立了哪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呢？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给以概括性的论述。

一、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省志编纂学理论指导四原则

（一）关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的观点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477页)新方志与旧方志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新方志是将生产和再生产的记述,即对生产和再生产及其体现的多种形式:工业、农业、畜牧、渔业、林业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商业、交通、邮电通讯等诸业的记述,作为构成其自身的主体构架。当然,旧方志也并非一点不记述和生产有关的内容,象嘉庆《广西通志》目录中,同生产有关的项目有物产、口粮、盐食、积贮四项。章学诚拟定的《湖北三书目录》有经济、食货、仓庾、水利、漕运、赋役、经济策要等七项。问题不仅在于旧方志对生产的记述在量的方面的微弱,还在于旧方志的编纂者不可能把生产和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高到世界观的意义上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特别重视并做好下述两方面内容的编纂:其一是,做好作为生产和再生产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编纂,而构成生产力最重要的内容又是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生产工具的性质,从来就是社会发展状况与发展水平的指示器,生产工具的变化,特别是由生产工具构成的近现代生产手段的变化,是直接同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其二是,做好人口编纂,这不仅因为人是生产力中的能够掌握生产工具的活的因素,而且还由于“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大家知道,为旧方志所忽略而为新方志所重视的便是对于人口发展历史演变与发展状况所作的真实记述。这种记述应当是科学的和具体的,并应揭示出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二) 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使历史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个科学的历史观的实质即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这一理论原则的巨大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它使“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在新方志编纂实践中应该怎样掌握并体现这一原则呢？可以举这样的例子说明：当我们编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我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等时，便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志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留下了它的深刻的时代烙印，但归根到底，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它的发展和演变又无不受着客观社会物质生活存在的制约和决定。我们对这一点认识得愈深刻，便愈会有着新方志编纂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自觉，便愈会有着对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认识的自觉。十分明显，从基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方志编纂学，即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存在的编纂学。这里的社会存在概念，是指以经济为基础和在以这一基础上存在着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民俗生活等在内的有着实体意义的社会存在。

（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矛盾、相互适应的观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为历史唯物主义